

西域史译丛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上册)

吉谢列夫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一

说 明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所述内容与古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关系极大，与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历史亦颇有关联，对我们研究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及新疆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译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翻译的，脱稿于“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后，译者又对原稿进行了一次校对。译稿交给我所后，我所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同志负责编校。现在作为资料予以铅印，原书图版亦加翻印。读者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注明出处亦请据原书。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中 译 本 前 言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的博士学位论文（1945年），曾获斯大林奖金（1950年）。书中对截至成书时候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包括叶尼塞河流域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萨彦—阿尔泰山区）考古资料作了系统总结，并结合我国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古人类学资料，对南西伯利亚古代民族的历史作了综合研究。

考虑到本书的参考价值，我们于1962年将本书的翻译工作列入科研项目，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译成初稿，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译文才得以校定。现在，我们将全部译文交付新疆民族研究所刊印，以应国内读者的需要。

本书于1949年、1951年先后出过两版，中文本是根据第二版翻译的。

本书的译校工作，主要是我室莫润先同志承担的，潘孟陶同志也曾翻译部分章节。本书的图版，大部分是我所技术室金仲林同志翻拍的，部分线图和地图是张心石同志重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一九八一年秋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版序言.....	(2)

第一篇 古 代

第一章 南西伯利亚的新石器时代.....	(6)
第二章 阿凡纳谢沃时期.....	(12)
一、阿凡纳谢沃墓地.....	(12)
二、叶尼塞河中游“阿凡纳谢沃人”的生活.....	(22)
三、阿尔泰的阿凡纳谢沃遗存.....	(28)
四、阿凡纳谢沃时期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地区.....	(31)
第三章 安德罗诺沃时期.....	(35)
一、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墓地概述.....	(35)
二、墓地的随葬品.....	(39)
工具(39) 饰物(39) 服装(39) 器皿(41)	
三、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遗址资料.....	(43)
四、安德罗诺沃时期的西伯利亚考古概述.....	(44)
五、结束语.....	(50)
第四章 卡拉苏克时期.....	(54)
一、卡拉苏克墓地.....	(54)
分布(54) 概述(55)	
二、卡拉苏克时期叶尼塞河中游的居民.....	(57)
三、随葬品.....	(58)
工具和兵器(58) 饰物(62) 陶器(64)	
服装残余(68) 食物残余(68)	
四、关于卡拉苏克墓地的结论.....	(69)
五、卡拉苏克居民的分佈.....	(72)
六、卡拉苏克居民的日常生活.....	(78)

七、卡拉苏克社会.....	(81)
八、卡拉苏克的艺术.....	(83)
九、卡拉苏克时期年代学.....	(86)
第五章 塔加尔时期.....	(90)
一、引言.....	(90)
二、塔加尔器物的分类.....	(93)
三、第一期.....	(117)
古塚及其随葬品(117) 塔加尔早期的野兽纹(121)	
第一期的年代(127) 塔加尔早期居民的生活(127)	
四、第二期.....	(132)
墓葬(132) 随葬品(133) 关于第二期的年代(138)	
五、最晚期的塔加尔坟墓(过渡性的第三期).....	(139)
六、叶尼塞河流域邻近地区塔加尔时期的遗存.....	(144)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144) 阿尔泰迈埃米尔文化(145)	
缩写符号.....	(153)
附 注.....	(155)
序 言(155) 第一章(157) 第二章(159)	
第三章(163) 第四章(171) 第五章(186)	
附 图.....	(201)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引起了许多反应：发表了一些书评，收到了不少信件，其中提出了建议和希望⁽¹⁾。

单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在再版时就不能不加以修改。但是，要修改的原因首先还是不断进步的苏联科学又有所进展。决定苏联科学持续前进的是：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²⁾。

在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中，斯大林论述语言学中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著作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这些著作揭露了马尔所谓“语言新学说”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³⁾。同时，斯大林的这些著作还阐明了许多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尤其重要的重大问题，那是远远超出语言学这门科学范围的。

十分明显，审查本书首先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领域这些巨大的进展。

我不是马尔的追随者，我是本着同他的“历史”论点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阶段“论”相反的观点来编写本书的；他的阶段“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削弱了苏联历史科学的。这只要回想一下马尔的追随者——虚构“钦麦尔”、“斯基泰”和“哥特”等“阶段”所造成的混乱就够了。他们把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的全部古代史塞进这些阶段，使古代史丧失具体性，也把轻信的研究者引上了虚幻阶段的道路。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本书的“时期”是同那些阶段针锋相对的。时期表示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当时当地所形成的环境中实际存在的人的共同体⁽⁴⁾的发展。

在解决阿尔泰突厥和叶尼塞斯基的起源问题时，我总是力求以古代部落的具体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和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根据。但是，在必须运用语言资料时，我未曾划清语言同文化之间的界线，不加批判地采用了马尔及其门徒所作的术语学分析的结论。这在本书新版中我已尽量改正。

古代突厥和斯基泰国家的名称也要这样来重新考虑。在第一版中我对此借用了恩格斯“野蛮国家”这一术语。后经研究得出结论：扩大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是不妥的。同时也明确了南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古代诸国的内部情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所说的罗斯和许多其它民族历史上前封建制时期的情况和发展方向很相似⁽⁵⁾。那些民族在巨大的奴隶占有制中心（罗马和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所形成的形势下发展起来而跨越了奴隶占有制。

南西伯利亚各民族则是在东方巨大的奴隶占有制中心（首先是中国的奴隶占有制）崩溃之后所形成的类似条件之下发展的。因此，他们也跨越了奴隶占有制的充分发展，经历了前封建制时期，以后的封建制的前提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前封建制时期与封建制的区别，这里也是首先表现在“农民尚未农奴化”。

此外，新版还补充指出了阿尔泰突厥人和叶尼塞黠戛斯人的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屡次夺得了对亚洲中部其它民族和部落所居住的广袤地域的统治权。这时，阿尔泰人和黠戛斯人的国家不断扩张，逐渐变得同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些帝国十分相似，“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6〕。

本书还作了一些其它的补充。首先是大大扩充了第二篇的“引言”，以说明匈奴—萨尔马特时期南西伯利亚诸部落发展的历史环境。此外，书中还补充了近年的发掘资料。书评和来信提出的意见，凡是我能同意的也都已采纳。

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对许多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批评给我的同志式帮助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С.吉谢列夫

第一版序言

研究西伯利亚古代史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彼得一世的时代,就曾搜集考古珍品和记述西伯利亚古迹。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都一直继续着搜集工作。不过当时没有提出过任何科学研究的广泛任务;人们所感兴趣的仅仅是古代的风俗习惯,无论是在格美林时代还是在斯帕斯基时代,西伯利亚研究者都没有超出这一步。

19世纪下半叶,与西伯利亚考古直接相关的两门语言学科(突厥学和芬兰—乌戈尔语言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卡斯特伦和拉德洛夫活跃在这一研究西伯利亚古迹的新时期,那并不是偶然的。然而卡斯特的继承者——芬兰人阿斯彼林、赫克尔和格烈诺等人的考古研究任务,却同泛芬兰民族主义语言学的反动观点紧密纠缠在一起,力图证明芬兰—乌戈尔因素在东方的传播为时很早而又范围很广,这便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至于拉德洛夫的学生,其中大部分人如麦略兰斯基、因诺斯特兰泽夫和马洛夫等等,则又相反地脱离考古资料而钻进纯语言学和文学领域,只是在研究古代文献和铭文方面才保持着同考古的联系。

在十月革命以前,西伯利亚的考古研究主要是由当地的地志爱好者进行的。他们作过大量发掘,但除了发掘和详略不等地报导发掘情况以外,别无其它。无论是库兹涅佐夫还是阿德里安诺夫,也无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古利亚耶夫等等,他们都没有提出研究历史的任务。不过西伯利亚考古资料的历史价值却是日益明显的。

最初试图把考古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用来解决古代史问题的,在青铜时代方面是戈罗德佐夫和塔尔格伦,在斯基泰—萨尔马特时期方面是康达科夫和托尔斯泰、明兹、罗斯托夫泽夫,在中期铁器时代方面是阿努琴和斯皮勤。尽管他们所作的观察十分重要,所提的假设非常精辟,由于他们是根据传统的迁徙公式进行分析的,这种分析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阻碍着他们做出科学的论断。上述方法论错误加上西伯利亚考古资料的毫无系统和零散不公式,以及堪,使得戈罗德佐夫和塔尔格伦根据西伯利亚各类铤的分布所设计的、互相排斥的民族迁移明兹和罗斯托夫泽夫所提出的、在许多方面针锋相对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关系理论,都是一样未经证实的。泛芬兰主义者那些远非科学的种族主义理论或者弗洛斯基的反动“研究”之得以存在,也是由于上述原因。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标志着我国生活的文化和科学大大提高,根本改变了西伯利亚考古研究的状况。这一事业转到了苏维埃考古学家手中,他们提出了对西伯利亚古迹进行历史研究的任务。因此,系统地整理搜集品便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发掘得法,收集了可靠而又有系统的考古资料,这使西伯利亚的全部古迹能够说明历史问题了。

在这条新路上,最初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是研究叶尼塞河中游的遗存。

格罗莫夫、阿威尔巴赫和索斯诺夫斯基的著作详细探讨了早在革命前就已经知道的叶尼塞河流域旧石器文化。他们的新研究弄清了大部分遗址属于马格德林时期,此外还分出了旧石器以后时期的遗址⁽¹⁾。

捷普楼霍夫和吉谢列夫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也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工作，分出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及其分期阶段，从而反映出叶尼塞河中游古代各部落的文化—历史发展情况⁽²⁾。

在阿尔泰，系统的研究是由格里亚兹诺夫进行的；后来索斯诺夫斯基在斯罗斯特基村附近发掘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吉谢列夫也在这里发掘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坟墓，从而补充和精确了以前的分类⁽³⁾。

在东部地区也做过类似的工作。索斯诺夫斯基调查了外贝加尔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划分了色楞格河流域铁器时代早期古迹的类别⁽⁴⁾。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贝加尔湖沿岸、安加拉河流域和勒拿河上游作过系统的发掘，使得有可能确定这些地区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10—14世纪的遗存的年代⁽⁵⁾。

奥克拉德尼科夫在雅库特境内勒拿河中下游的工作，为西伯利亚北部古迹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第一批资料⁽⁶⁾。

我们还要提到格里亚兹诺夫和格拉科娃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西北部的考察以及德米特里耶夫在乌拉尔地区东部和切尔涅佐夫在鄂毕河下游、额尔齐斯河下游及雅马尔半岛的工作⁽⁷⁾，这使我们初步了解到西西伯利亚居民的发展情况。

通过这些研究和本书所述的其它许多研究，西伯利亚的考古资料大都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具体地说明了西伯利亚各地在各个时期中的文化—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古代居民的历史特点。

一篇简短的引言即使要简略地叙述在系统整理西伯利亚古迹方面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在以后各章加以介绍。

由于在考古分期方面取得了成就，弄清西伯利亚古代居民的经济文化发生变化的原因便提上了日程。

在这方面的最初尝试还没有完善的研究方法。同初步尝试研究苏联欧洲部分的考古资料一样，这里的工作也仅仅限于对西伯利亚古代诸部落的历史公式化地反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所阐明的原始公社制的普遍发展规律。

1933年吉谢列夫发表的《叶尼塞河流域民族的解体和封建制度》便是一例。这部著作中还严重地存在着社会学公式，在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同志就主要历史问题发表意见以前，这种公式在考古学中占统治地位⁽⁸⁾。

经过探讨历史的一般理论问题并且进行相应的研究工作，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最初的观点。在涉及原始社会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父权制关系的产生过程和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等方面也是这样。我们深入研究了资料，认识到过去把南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各民族的早期阶级社会诸形态仅仅理解为以早期封建剥削形式为基础的早期封建社会形态，那是太简单化的。我们已经知道，奴隶占有制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它的基础上，贵族个体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进而从原始公社制准则的束缚下逐渐解脱出来。与此同时，我们特别注意过去居住在西伯利亚不同地区的各个部落的经济、习俗、文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地方性特点。这使我们看到西伯利亚古代诸部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情况。最后，解决西伯利亚现代诸民族起源问题的初步尝试，也是西伯利亚古史研究的这个新时期的一个标志。这些问题都是第一次摆在研究萨彦—阿尔泰的考古学家们面前的。

以上所述，都在1938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苏联历史》的头两卷中首次有所反映。这部

著作各章由格里亚兹诺夫、伯恩施坦、古谢列夫，奥克拉德尼科夫、波塔波夫、索斯诺夫斯基和托尔斯托夫等人执笔，试图历史地总结西伯利亚考古新资料，力求阐明各部落的发展特点。

遗憾的是，此后的工作受阻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不过在战后，工作立刻得到恢复，1946年就出版了A. H. 伯恩施坦的《7—9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人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于阐明南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居民历史发展的一般情景，此书无疑是有价值的。它解决了萨彦—阿尔泰高原诸突厥语部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局部问题，并且第一次广泛地探讨了族源。但是与此同时，该书还有许多根本性缺点，那主要是不加批判地采用第二手考古资料所造成的。伯恩施坦在处理这些资料时显得十分任意。因此，他得出了许多大可争论的论点，例如硬说过有什么鄂尔浑—叶尼塞古突厥共同体，这一论断无疑是有疵病的，那是用主观臆断代替某些突厥民族如阿尔泰突厥人、叶尼塞黠戛斯人（即哈卡斯人）和贝加尔湖沿岸的库雷康人（据奥克拉德尼科夫研究，在极北突厥族——雅库特民族的形成中，库雷康人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实际历史。

本书力求反映过去研究南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古代诸族历史的经验。其目的是在于研究迄今所积累的所有最重要的考古和文献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就南西伯利亚两个主要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的历史发展实际过程及其原因作出结论。在这一方面，作者力求运用各种史料，尽量全面地选择有关南西伯利亚现代诸民族的资料，首先是关于阿尔泰人和哈卡斯人（叶尼塞黠戛斯人）起源的资料。

有关这些地区各时代史料的情况和研究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有的地方我们只限于必要地提及业经深入研究的事实，而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历史分析和结论方面。有时我们还要先进行史料学研究，然后才能加以综合。可惜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因此本书的史料学研究分量很大。但是我认为，全部结论一定要有严谨的论据，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论证这些结论的事实加以鉴别。我力求把史料学的部分叙述得恰如其份，但是做到了什么程度，当然不是我所能说的。

我阐述了南西伯利亚诸部落从原始母系氏族公社到形成萨彦—阿尔泰诸民族及其古代国家这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历史道路，其正确程度如何，也请读者去评论。

遵循马、恩、列、斯的历史著作所作的分析范例，我首先力图说明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而不偏离其基本方向。

当然，如果没有我的西伯利亚同行支持和帮助，我是完全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多承他们欣然提供自己的资料，并且把自己的推断和结论见告，我谨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我在西伯利亚旅行和叶美秋霍娃与我领导的二十年考察所进行的研究而写成的。考察队的组织者是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和国家历史博物馆，地方机关也曾经经常给予支持，其中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和哈卡斯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帮助特多。我要特别致谢。我将永远铭记哈卡州、图瓦州和戈尔诺—阿尔泰州领导机构以及从秋明到海参崴所有中央和西伯利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给予我的亲切招待和协助。

还应当提到那些普通的人们如俄罗斯人、哈卡斯人、图瓦人和阿尔泰人同我们在考察中共患难，是他们从事发掘，才取得了作为本书基础的资料。我力求对我们悠久的历史的光荣历史的远古时期作出力所能及的说明，以此向他们报答。

C. 古谢列夫

* 1959年更名为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者。

第一篇 古代

第一章

南西伯利亚的新石器时代

关于萨彦—阿尔泰的旧石器时代，我们是有相当了解的。与此相反，对其新石器时代遗存则仍然研究甚少。

比较清楚的是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和勒拿河沿岸的原始森林地区。经过伊尔库茨克考古学家的努力研究和近来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工作，在这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不久以前有些综合性著作对这些资料作了分类。应该同意这些著作的作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意见，他断定谢罗沃期的遗存是原始森林猎人和渔人各个母系氏族群体的遗存^[1]。

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沿岸新石器时代的谢罗沃遗存，不仅可使我们相当清楚地了解留下这些遗存的居民，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遗存中，个别极有代表性的器物，大概经过在相邻各个狩猎氏族群体之间长期流转交换，而传播到谢罗沃本土以外相当遥远的地方，可以作为断定贝加尔湖沿岸古物与其它地区出土的古物属于同一时期的珍贵证据。

在这些遗存中，首先必须提到出土的石刻鱼像^[2]。

在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沿岸，这些鱼像是同新石器时代谢罗沃类型的墓葬相联系的，出土于这些地区的科尔金诺、塞列德卡、利西哈和格拉兹科沃早期诸墓地的坟墓中。乌兰—哈达遗址出土的类似鱼像残片的层位（介于第9层与第3层之间），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谢罗沃遗存的主要地区以西，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受到风力严重侵蚀的巴扎依赫遗址亦有石鱼发现^[3]，后来在米努辛斯克地区又发现3件^[4]：一件在北面的锡锡姆河河口，另一件在南面的列别什金村附近，还有一件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某处。此外，在西面的巴腊巴草原，也发现一件石鱼^[5]。所有这些发现物表明，在安加拉河—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谢罗沃时期，西南邻近各地区即有居民，他们留下了这些可资断代的遗物。

当地有哪些发现物可以认为是属于石鱼传入叶尼塞河流域时期的遗物呢？

可惜在叶尼塞河中游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竟无法找到即便是初步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料。当地遗址文化层的情况是十分可怜的。古代的畜牧方式显然早就让牲畜践踏了沙丘的草皮，结果保存文化层的沙丘加地了吹散的过程。因此，只有在沙滩上、在河流两岸和松林丛生的丘陵地带进行细致的工作，才能发现未经扰乱的古遗址文化层的零星遗迹。现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正在不无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不过日前该馆的考古学家列瓦舍娃和她的同事发现的文化层，都是属于晚期的。调查人员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沙丘遗址，主要都是各个时期的杂乱而又混淆的资料。

因此，现在不得不放弃在米努辛斯克地区诸遗址搜集成套器物并鉴定其年代的打算，更何况这个地区晚期墓葬出土的石器，已经表明新石器时代许多十分古旧的器形（如石镞）都

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如果根据遗物如此贫乏的情况和晚期还残存着新石器时代的工具这些事实，来否定叶尼塞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本身的存在，那是不正确的。

与此相反，根据米努辛斯克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料和金属时代早期的事实看来，首先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近年来的研究扩充了对叶尼塞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关资料的认识。这就是索斯诺夫斯基在科科列沃村地区的遗址（“扎博奇卡”和“红谷”）以及在布祖诺沃村附近的遗址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移民点”附近的遗址（早在1912年便由谢尔盖耶夫开始研究）所作的发掘，还有阿威尔巴赫和格罗莫夫在比留萨的发掘（B—C层）^[6]，以及索斯诺夫斯基、格罗莫夫和阿威尔巴赫在阿方托瓦山Ⅱ区（上层）、Ⅵ区、格列米亚奇泉诸地遗址的发掘^[7]。

上述遗址研究者全都归之于冰川退后时期。他们认为只有比留萨下层（C）、移民点、扎博奇卡和布祖诺沃的年代较早，属于叶尼塞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前半期^[8]。索斯诺夫斯基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高出水面9—12公尺的台地，有大陆性的干燥气候，猛犸已完全绝迹，北极狐已离此北迁，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周围的动物群中，以驯鹿和马居多。

“按照西欧的分期法，这一时期应相当于马格德林期之末或阿齐尔期之初。”^[9]

上述其余的遗址按格罗莫夫的划分属于第三组，相当于欧洲分法的阿齐尔期，特点是干燥气候继续发展，草原动物占统治地位，尤以马和野牛占优势，山区则以野绵羊和高鼻羚羊居多。看来，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只有驯鹿还长期生存下来^[10]。

根据叶尼塞阿齐尔期诸遗址的出土资料，关于这个遗址的居民生活方式，可以作出下述结论^[11]。

从这些遗址的器物成分中，可以看出已经朝着改善和细分工具的方向发生变化。切割器的数量愈来愈多，石刀（长方形的棱柱体装柄石片）的质量也逐渐改善。对称的树叶形尖状器占多数，这大概是矛头。在砍伐器中，除了从前的圆盘形手斧以外，出现了新的厄博舍形（Эбошевун）石斧，它的刃部作半圆形，两面加工，可能已装柄。在各种小型石器中，也有分工的迹象。骨器则见减少。食物残余也同工具群一样证实了狩猎已经不是以猛犸，而是以马、鹿、牛、孢、兔和沙鸡为主要对象。

但是，只用手掷武器而狩猎装备基本上同从前那样，是不能保证在有限的地区源源猎获的，这就决定了加强流动性和缩小各狩猎群体的规模。

这时，较早类型的、文化层很厚的遗址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新的薄文化层，中间隔着不含遗物的间层。这说明遗址有人居住不是一直不间断，而是时断时续，经常被遗弃，又被辗转流徙寻觅野兽的狩猎者所占据。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有许多特点很象贝加尔湖沿岸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中所能见到的情景，那些文化层也是厚度不大，面积有限，还含有从前的手掷狩猎器^[12]。

关于新石器时代初期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类生活，我们所知大体就是这样。据此可以大胆断定，从上述阶段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金属时代早期阿凡纳谢夫斯基的发掘所反映的那个阶段。后者已经有了畜牧业，经常使用弓箭并加工金属，有发达的制陶业，在葬俗方面反映了复杂的宇宙起源观念。

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石鱼，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文说明贝加尔湖沿岸紧接谢罗沃期（以石鱼为特征）的基多伊期的遗迹，同

阿凡纳谢沃的材料是同期的。因此，叶尼塞河畔列别什金村附近沙地和锡锡姆河河口新发现的谢罗沃期石鱼，当属于早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的米努辛斯克新石器时代文化。

这样，我们便有相当根据认为：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存在着新石器时代发达期的特殊阶段，介于叶尼塞阿齐尔期同金属时代早期的遗存之间，只有这个时期的人们才可能同贝加尔湖沿岸石鱼的制作者同时。

这个假定的正确性还有其它事实可以证明。其中首先应当提到几个保存了文化层残迹的米努辛斯克遗址，这些遗址是“被怀疑”属于新石器时代的。

阿威尔巴赫在土巴河沿岸进行考察时发现了博古尔塔克遗址，无论他本人或熟悉他的资料的索斯诺夫斯基，都无法把这个遗址归之于叶尼塞阿齐尔遗址群。博古尔塔克遗址看来较晚，无疑是新石器时代的。可惜这个遗址的研究结果目前尚未发表。

捷普楼霍夫早在1929年就告诉我说，他曾在巴帖尼村外发现了多层村址的残迹。

这个遗址的下层只有一些石器和带有草擦痕迹的光滑陶器。骨骼都是兽骨。捷普楼霍夫认为此层为新石器时代“前阿凡纳谢沃时期”的遗迹^[13]。

捷普楼霍夫还在那里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前阿凡纳谢沃时期的墓葬。据研究该墓出土人架的捷别茨说，人架头骨很特别，不象较晚的阿凡纳谢沃男子头骨，说它有点象那时的女子头骨倒还可以。无论如何，它同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原始森林地带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占绝大多数的蒙古人种没有联系。从许多特征来看，它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近郊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头骨倒相似；捷别茨断定后者是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类型（见所著《苏联古人类学》，1948，页61—63、68、69）。

米努辛斯克盆地有新石器时代还可从研究邻近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区的新石器时代得到上文证实。在概述叶尼塞河流域阿齐尔诸遗址时，已经列举过关于这个偏北地区阿齐尔诸遗址的资料。

看来，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情况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阿齐尔型遗址的生活是很少有区别的。

卡尔佐夫发掘的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下层的出土资料，恰恰说明了这一点^[14]。

可惜这里出土的不是工具，而只是工具残片。不过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据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居民仍旧是捕兽的狩猎者。

根据格罗莫夫的鉴定，下层以鹿骨特多，其次是狍、野猪、熊、松鼠、狼和鸟类的骨骼。这同阿齐尔最晚期遗址的文化层很少有区别。该层不含陶器，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下层可能同阿齐尔遗址（科科烈沃村附近的基皮尔谷遗址和卡缅谷遗址、阿凡托瓦Ⅱ—上层、阿凡托瓦Ⅵ、格烈米亚奇泉、比留萨B—C，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前者几乎完全没有驯鹿骨骼而以鹿骨为主（在此以前，鹿骨在叶尼塞河流域诸遗址的阿齐尔晚期各文化层中都没有发现过）。这个情况也说明，它同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中后一时期的，即压在上面的文化层有一定的联系，该层已经是属于青铜时代，有家畜骨骼。

卡尔佐夫认为，在耶尔莫拉耶沃古城下面掘出的遗址文化层，所反映的生活早于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下层^[15]。

这个意见看来是不对的。必须注意到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下层没有一块陶片，而耶尔莫拉耶沃古城下的遗址的陶片却相当多，而且有纹饰，同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第三层的有

纹陶片相似^[16]。这样来断定耶尔莫拉耶沃遗址的年代（介于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下层同第三层之间），乍一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各层的结构上，没有任何中断的迹象。

不过这一点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有意义，即假如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各层年代很早。然而，这些层次是研究者任意划分的，即把索巴金纳遗址文化层随意分成厚度各为20厘米的地层^[17]。

因此，无法肯定乌斯特—索巴金纳文化层不间断。

可惜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文化层中的器物埋藏情况未曾经过准确测量，因此，我们只好把卡尔佐夫划分的层次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研究者的描写，应当认为整个第三层晚于耶尔莫拉耶沃文化层。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首先，耶尔莫拉耶沃文化层没有乌斯特—索巴金纳第三层所含的家畜骨骼（绵羊骨，可能还有猪骨），同时，那里的野兽遗骨成分同乌斯特—索巴金纳第四层即下层相似（不过后者不含鹿骨）。

在这里，不能忽视动物群差别的资料。

卡尔佐夫确定耶尔莫拉耶沃古城下遗址年代同下文将要研究的阿凡纳谢沃遗存相符。但是，这种断代恰恰同他自己所确定的地层关系有矛盾。因为这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把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没有陶器的第四层（即卡尔佐夫认为晚于耶尔莫拉耶沃的一层）几乎断归阿凡纳谢沃之后的时期，即至少是属于压在上面的第三层的末期。

然而，若将耶尔莫拉耶沃文化层断在介于乌斯特—索巴金纳第四层同第三层之间，那就完全可以排出所有遗址的顺序，同时，对这些遗址出土器物的研究也肯定了这种排列。

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下层即第四层既与叶尼塞河流域阿齐尔晚期遗址接近，也很象还没有陶器的乌兰—哈达第十一层。耶尔莫拉耶沃遗址的器物同贝加尔湖沿岸诸遗址的器物一样，表明了新石器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流行弓箭（出土有箭镞）、制造陶器。制陶业的后一阶段反映在已经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乌斯特—索巴金纳遗址第三层。这种排列乍一看来是同卡尔佐夫认为耶尔莫拉耶沃遗址的陶器具有阿凡纳谢沃陶器的面貌这一意见相对立的。诚然，在研究者所提出的两类纹饰中，用“毛虫形”模具压印者在阿凡纳谢沃陶器中也有类似的纹饰^[18]。但是，不能不同意卡尔佐夫自己的意见：这同蛋状的器形一样，“在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可以见到”^[19]，所以它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根据，来证明耶尔莫拉文化层属于阿凡纳谢沃时期。

因此，尽管有相当困难，我们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断为金属时代以前阶段的遗存，把它们视为阿齐尔诸遗址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还可从发现一件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型的鱼象这一事实得到证实，这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一个最著名的沙丘遗址发现的，此遗址位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对面的巴扎伊赫村附近。

近年来该遗址的调查发现一些迹象，表明这里过去曾有多层的文化堆积^[20]。

在该遗址采集到的各时代器物中，特别是在一部分陶器、箭镞、斧和砍刀工具等物中，我们发现有些器物可以同上述具有新石器时代面貌的遗存联系在一起^[21]。

当然，这些器物有一部分可能出自很早的文化层，但是安加拉河—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谢罗沃期的鱼象同时发现，可藉以推测巴扎伊赫早期的部分发现物属于新石器时代。因此，这里也同米努辛斯克盆地一样，石鱼的发现使我们更有把握地说，叶尼塞河沿岸也有同

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沿岸的谢罗沃斯基相近的新石器阶段。

对于萨彦—阿尔泰西北各地区，看来也可以这样说。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这里出土的科学发掘资料，只有零星的事实。根据巴腊巴草原发现有安加拉河—贝加尔湖沿岸型的石刻鱼象，可以说这里有与谢罗沃斯基相当的新石器时代^[22]。在南面的比斯克、巴尔纳乌耳和谢米帕拉丁斯克的山麓草原，目前还根本没有研究得较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不过这仅仅是由于那些地区未曾研究的缘故。

在战前，由于谢尔盖耶夫和马尔科夫在比斯克近郊的努力工作，索斯诺夫斯基得以研究斯罗斯特基高地楚河河道流入卡通河谷之处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23]。如果撇开托木斯克城的“所谓野营地”的猛犸遗骸周围的著名燧石器发现地，这个遗址便是西西伯利亚的头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24]。它无疑证明西西伯利亚在第四纪已有人居住，而在不久以前，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的某些研究者还否认这一点。

如果说我们在阿尔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那么下一个已属肯定的遗址群便是金属时代早期的阿凡纳谢沃类型的遗址（见下文）。这两个阶段在年代和发展水平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旧石器时代为“投矛”狩猎，阿凡纳谢沃期则已定居渔猎，且有牧畜饲养业萌芽），因此两个阶段在这里也是不能衔接的。其间无疑存在着新石器阶段。这个阶段的零星遗物，象窝纹陶器和相当数量的燧石器，研究者在鄂毕河上游调查沙丘遗址时早就发现过。1936年曾获得很多关于阿尔泰新石器问题的资料。索斯诺夫斯基在研究卡通河畔库尤姆地方的阿凡纳谢沃坟墓时，在这些墓葬的封土下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25]。此遗址上层接近阿凡纳谢沃坟墓，含有典型的阿凡纳谢沃陶器、燧石镞和动物骨骼。

库尤姆遗址下层以一道不含遗物的20厘米夹层同上层分隔。这一层借出有比较古旧的遗物：石刮削器、石核状工具、边缘经过修整的刀形石片和一件以嵌入法制作的骨器碎片（骨槽内嵌有燧石片）。其陶器纹饰和制作技术都有特点。在这方面特别明显的是一件饰有杉针纹的大容器（图版Ⅵ，图19），与阿凡纳谢沃的陶器不同，其壁部经过磨光，表面没有阿凡纳谢沃的陶器所特有的那种草的擦痕。这种陶器还有几件与之相似的偶然发现物，均可视为与1939年托尔斯托夫发现的、前金属时代花刺子模的所谓“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容器近似。燧石制品的相同，特别是从侧面修整的刀形石片、石核状工具和刮削器的相同，也说明库尤姆遗址下层同克尔捷米纳尔遗址相近^[26]。

在巴尔纳乌耳附近楚达茨山遗址文化层下面发现的一处墓葬，接近于库尤姆下层（但更为古老）^[27]。墓穴深0.75米处有一具仰身直肢葬的成年男子骨架。死者身旁发现4件角质复合鱼钩（同安加拉河与贝加尔湖沿岸基多伊期的鱼钩相似），还有一件角质鱼叉和大约20件石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从侧面修整的刀形石片，它同早期的库尤姆石片和克尔捷米纳尔石片非常相似。楚达茨山墓葬之所以显得古老，是因为它不含陶器。死者仰身直肢葬也说明墓葬很古，不同于阿尔泰的阿凡纳谢沃墓葬。

介于楚达茨墓同阿尔泰阿凡纳谢沃诸墓之间的遗存，大概目前仅有两座墓葬为代表，那是鲁金科在阿尔泰山区的扬—乌拉干河畔发掘的^[28]。这里的人架也是仰身直肢，身旁也没有陶器。同阿凡纳谢沃墓葬一样，死者以赭石染色，墓葬上有封土。死者的体质类型则只能根据扬—乌拉干河畔的人架来断定。这些人架与阿尔泰、米努辛斯克的阿凡纳谢沃人架同属古欧罗巴类型。

上述资料尽管贫乏，仍然相当清楚地说明，阿尔泰前阿凡纳谢沃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文化具有北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有一些特点表明它同西南地区即中亚细亚有联系。在萨彦—阿尔泰，这些联系就是到较晚时期也没有断绝。

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不能对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以西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活方式作出任何结论。从器物的相当一致和遗址的性质来推断，叶尼塞河沿岸和阿尔泰的情况同奥克拉德尼科夫所说的东面地区的情况是很相似的。渔猎人形成小型的母权制公社，使用弓箭和渔网，磨制石器——这些我们认为都是无可争辩的。不过当时无疑也有一些由环境的特殊所决定的纯地方性特点。这些特点在南面草原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山麓草原）得到了发展。

毫无疑问，萨彦—阿尔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同西方和西南方的联系促进了这一发展，这些联系使第一个地方性的金属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甚至同外乌拉尔西部地区也还相当近似。

第二章

阿凡纳谢沃时期

在米努斯克盆地，阿凡纳谢沃遗存是新石器时代以后最早的遗存，目前已经发现很多，主要是墓葬（约80个）和一些被风吹散的沙丘遗址的出土物。

一、阿凡纳谢沃墓地

阿凡纳谢沃墓葬聚集在几个不大的墓地上，这些墓地一般靠近水边或现在的河滩地（只有1925年在巴帖尼村附近“两个山坳”发掘的五座墓葬是例外。后来的墓葬总是距台地边缘较远）。

目前已经发现的墓地有：捷普楼霍夫在阿凡纳谢沃山下（墓地总名称即由此而来）巴帖尼村附近⁽¹⁾和“两个山坳里”⁽²⁾发掘的墓地，吉谢列夫在司达村、帖西村和小科彼内村附近发掘的墓地⁽³⁾，以及列瓦舍娃在奥格拉赫提山南坡下克拉斯内伊雅尔村附近发现的墓地。

鉴于大部分墓地的资料目前已经出版，我们这里只谈最重要的方面，细节请参阅专著。

阿凡纳谢沃山下巴帖尼村附近的墓地座落在从码头通往村庄的道路旁边高出河滩的台地上。据捷普楼霍夫统计，这里约有25座墓（1920年、1921年、1923年发掘）。从地表可以看到露出来的石头，间或还有不大的洼坑。这些石头是直径2—7米的圆形石台的一部分，石台是遗墓时在地面所砌。每个圆台下面都有一个平面呈椭圆形或大体四角形的墓穴，穴内通常填满石块。墓穴的大小随埋葬死者的多少而定（面积为16—0.5平方米，深度一般为1.5米）。

墓中死者有男有女，有个体葬，也有集体葬，兹列表如下，以便了解阿凡纳谢沃墓地的墓葬情况（见13页）。

阅表时请注意骨架重叠的情况，这种现象无疑表明同一墓穴曾相继使用。如何埋葬（集体葬还是个体葬）看来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死者不是简单地同先葬者放在一起，而是葬在先葬者的上面，中间隔开。后葬者有些也不是个体葬，而是集体葬。但在巴帖尼村，集体葬是较少的。如果统计全部个体葬（包括两个幼儿），其总数为16，几近于73%；如果加上两个带乳婴的女葬，则其比例约增至82%。这个数字也还不完全，因为在15号墓发现有1个男子、3个女子和8个幼童的骨架，这些骨架已被扰乱，高低不一，根据研究者的意见，可能是相叠的，因此，假如它保存完好的话，个体葬的百分比还要增加。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它是集体葬。因此，只有3处是没有疑问的集体葬。其中一处是一对性别不明的骨架（12号I层）；另一处（12号II层）包括男子、女子和乳婴的骨架各一具，男子和女子还手牵手，很可能是一对夫妇，而且三人同葬一墓，未必是由于同时自然死亡的缘故。

另有一处（6号）包括女子和幼童骨架各一具，幼童身旁还有三具骨架，可惜研究者没